

日本为什么没有医患纠纷

前些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日本一家电视台一场心脏手术的高清直播,感触良多。电视台不但直播了手术,而且在手术室隔壁的房间搭建了一个与现场互动的演播间,请到了日本一位德高望重的心脏外科专家和两位名人嘉宾来讲解。嘉宾问了专家很多病人家属关心的医学问题,比如,你以前有过手术失败的经历吗?再比如一个中国人会非常有共鸣的问题:当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时,病人家属来投诉、咒骂甚至肢体冲突时,怎么办?

日本专家的回答是,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。他进一步解释说,因为日本的手术是完全“透明”的,当病人要进行高风险手术前,医生会很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、对话,患者及家人在术前一般就已对手术了如指掌。那么,会有医院和医师故意把风险评估得很高,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推卸责任?回答是,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上海某大医院开刀的事。当时我是头部外皮生了个脂肪瘤,医生建议做摘除手术。手术前,医生只露过一次面,十分有信心地说:“小手术,一点问题没有,明天早上8点来就行。”

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日称,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没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,政治类、人权类社会组织“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”。李立国这一表态是开放的、进步的,但关键还是在于实践中的落实。

对于中国必须发展社会组织的问题,100多年前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上就有精到的论述,他在《变法通议》中的“论学会”一文中指出,中国的落后与缺乏“学会”有着密切关系。梁启超所说的“学会”,相当于今天的“社会组织”。他说:“道莫善于群,莫不善于独。独故窒,窒故愚,愚故弱。群故通,通故智,智故强。”意思是社会的良善在于“群”,人们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可以互相沟通,有了沟通就变得聪明,人民聪明了,国家自然也就强大了。

也许有读者会说:“难道中国的社会组织还少吗?”有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中国的“社会组织”确实非常多,但是,此“组织”非彼“组织”。梁启超在《变法通议·论学会》中指出了关键性的区别:“群之道,群形质为下,群心智为上。”通过政府等权力建立的“组织”属于“形质”的层面,这种“组织”在中国不仅不缺乏,而且特别发达,中国所缺乏的是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。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是由人们按照共同的志趣、志向自由组合起来的,因而属于“民间”的,在现代就是相对于“政府组织”而言的“社会组织”或“民间组织”。100多年前的梁启超抓住“心智”这个关键点,是非常精到的。心的集合,便是自愿、自发、自由。

在一个法治社会,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自由的,但也必须是登记的,由登记而区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,只有进行了登记的才是合法组织,不进行登记的是非法组织。登记有准许和不准许的选择,这是对政府的考验,衡量着政府拥抱自由的程度。社会组织也有登不登记的选择,这是对社会组织选择的考验,衡量着社会拥抱法治的程度。如果过度约束社会组织登记,使登记成为一个艰难乃至危险的进程,则一个国家难以有大的进步和发展。如果藐视乃至无视登记,“社会组织”以不登记而自得,则是一个国家法治的灾难。

这几年来,中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较快,但远远不够,总体来说,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低水平。梁启超曾描述一个国家发达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后,“遵此行之,一年而豪杰集,三年而诸学备,九年而风气成”。中国真正的现代化,有赖于“遵此行之”。愿李立国的表态能促成中国形成新“风气”。

(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5.9 顾则徐/文)

社会组织如何发展?

也许有读者会说:“难道中国的社会组织还少吗?”有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中国的“社会组织”确实非常多,但是,此“组织”非彼“组织”。梁启超在《变法通议·论学会》中指出了关键性的区别:“群之道,群形质为下,群心智为上。”通过政府等权力建立的“组织”属于“形质”的层面,这种“组织”在中国不仅不缺乏,而且特别发达,中国所缺乏的是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。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是由人们按照共同的志趣、志向自由组合起来的,因而属于“民间”的,在现代就是相对于“政府组织”而言的“社会组织”或“民间组织”。100多年前的梁启超抓住“心智”这个关键点,是非常精到的。心的集合,便是自愿、自发、自由。

在一个法治社会,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自由的,但也必须是登记的,由登记而区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,只有进行了登记的才是合法组织,不进行登记的是非法组织。登记有准许和不准许的选择,这是对政府的考验,衡量着政府拥抱自由的程度。社会组织也有登不登记的选择,这是对社会组织选择的考验,衡量着社会拥抱法治的程度。如果过度约束社会组织登记,使登记成为一个艰难乃至危险的进程,则一个国家难以有大的进步和发展。如果藐视乃至无视登记,“社会组织”以不登记而自得,则是一个国家法治的灾难。

这几年来,中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较快,但远远不够,总体来说,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低水平。梁启超曾描述一个国家发达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后,“遵此行之,一年而豪杰集,三年而诸学备,九年而风气成”。中国真正的现代化,有赖于“遵此行之”。愿李立国的表态能促成中国形成新“风气”。

(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5.9 顾则徐/文)

五六年级是痛苦的开端;我考入了强化班。六年级,为让我考入好初中,父亲将我送往离家较远的地方上学,在校外租了间房子。读书几个月没人探望,我走了两个小时回家。见到父母时,第一句话竟是问成绩,临别还是,我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了。

中考前,父亲那句话我今生难忘:“考不上江中(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),你就去死,家里有药有绳……”我是含着泪跑回房间的。我不明白,考一个好高中比儿子的存在更重要?

我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自卑,在父亲看来,只有考高分的

我快被逼疯了

学生才能有自尊。上高中后,我毛病百出,先是强迫症,这学期头又痛,已经痛了两次,每次痛两周,需挂一星期点滴,医生说是压力太大造成的——我一进学校,无异于进了监狱,分外难受。

2008年元旦回家,我和父亲又吵起来了。父亲又说了那段他说了无数遍的话:“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,早点死,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……”我实在无法忍受,说了句心里话:“没有你,我不会这么差。”换来的只是嘲讽。叔叔说应多鼓励我,父亲拍案:“他不是那种人,跟畜牲还讲鼓励……”我出了屋。

父亲与老师只要成绩,我的感受却无人问津。班主任常打电话给父亲让父亲给我施压,我每次向班主任说真话换来的只是怀疑与鄙夷,她只看到我成绩的下降。

有天我带了本《莫泊桑小说集》到班上,被没收。班主任说,没把成绩搞上去不允许看,这些书只会让人越来越颓废。第二天下课我翻了翻《雅舍小品》,又被没收。班主任甚至不允许我写小文章,认为语文老师未作要求而学生去写是浪费时间。

隔了一两天,班主任打电话给父母,父母来了。班主任说我头痛是因为小说看多了。我无言。“你不想参加高考?说实话。”班主任问。我踌躇再三——“不想!”我不该说真话。“收拾书包回去……回去你也别想活!”听着父亲的这句话我冲出了办公室。我受够了!我当时心跳加速,有些颤抖,接着做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事——跑回教室,将教科书全部扔到了楼下!我真的受够了……

(摘自《中外文摘》第5期 章锐(高三学生)/文)

应该让“文革”史进入教科书

不可否认,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,“文革”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——能记住这个符号,就已经不错了,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。最令人震惊的是,“文革”竟然以一种全然正面的形象,进入年轻人的视线,尤其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的视线。在他们的印象里,“文革”就是一场人民群众痛打当权派的运动,以致一些人因为对时下贪腐现象的不满,错误地呼唤“文革”的复归。

事实告诉我们,即使在21世纪,中国产生“文革”的土壤仍然还在。如果没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清理,“文革”是不会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。事实也告诉我们,“文革”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怀旧情绪,还是某些野心家可以利用的资源。真要是找对了火候,煽动起类似“文革”的情绪,的确可以造成某种民粹式的声势。西方二战大屠杀的历史,过去的时间比“文革”还要长得多,但是,不仅各种纪念馆年年对游人开放,各种纪念文字、电影、电视作品,年年一年地在反思,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,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

造反者的「秘籍」：先用之，后弃之

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,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富商当官,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,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,民间传说,他与朱元璋结拜为金兰兄弟。明政权定都南京后,要修筑城墙,财政捉襟见肘,于是,沈万三出巨资,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,还献出白金2000锭,黄金200斤。

有一次,君臣闲聊,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,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搞劳三军。

朱元璋冷冷地说:“朕有兵马百万,你搞劳得过来吗?”沈万三应声答道:“我每人搞劳一两黄金如何?”

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,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,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阴险的莫测变幻。

《明史·后妃传》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,朱元璋与马皇后的交谈:皇帝忍着怒气说:“一个匹夫要搞劳三军,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,朕一定要杀了他。”

中国的每一个朝代,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,任由工商自由,恢复民间元气,明代也不例外。朱元璋登基之后,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,减轻民众负担,同时还明令不得扰商,官府不能低价强买民物。

然而,当政权稍有稳定,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每次朝代更迭,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。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:“元氏懦弱,咸福下移,驯至于乱。”也就是说,中央集权涣散,民间的势力强大,才造成了祸乱。因此,当他听到沈万三要搞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,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。对于商人阶层“先用之,后弃之”,朱元璋非第一人,前可见两汉的刘邦、刘秀,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,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“秘籍”。当剪灭蒙族成国家战略之后,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。1373年,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,充军云南,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。

《明史·纪纲传》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:朱元璋驾崩后,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,是为明成祖。纪纲是朱棣心腹,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,此人极善敛财,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,将其资产全部抄收。当时,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,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,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,爬着去求见纪纲,进献了黄金、龙角等珍贵之物,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,年年供奉,岁岁孝敬。

一个时代或国家,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,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: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,是站着的,还是坐着的,或是“跪”着的。从沈万三的“搞劳三军”,到沈文度的“蒲伏见纲”,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,可见一斑。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,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。(摘自《浩荡两千年》中信出版社出版 吴晓波/文)

朱德儿媳赵力平的悲欣家事

陈方:无线电爱好者“远征”黄岩岛

从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的时间里,江苏省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秘书长陈方两度登上黄岩岛,一共在岛上作业13天。对于他来说,对黄岩岛的关注并不仅限于爱国情结,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牵挂和羁绊。“BS7H”呼号 来自黄岩岛,来自中国所谓“DX远征”,英文为“DX-pedition”,是无线电爱好者把远程通信的无线电缩写“DX”和单词“expedition”组合而成的,指的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,为了远距离通信活动,来到一个业余电台十分稀少的地方进行操作,简称为“DX远征”。

陈方介绍,在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界,有一个大家认为最公正的“游戏”——“DXCC”。“DXCC”指的是“联络百个远距离电台俱乐部证书”,也就是说,如果能联络到100个“DXCC前缀表”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业余电台,便有可能获得该证书。该证书由美国无线电转播联盟颁发,在业余无线电界影响最大。如同集邮一般,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迫切地想来自“DXCC表”中的每一个地点进行无线电联络,或者亲自到那些人迹罕至的“DXCC实体”去操作业余电台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,没有进行过业余电台远征活动的岛屿已经所剩无几,地处偏远,人迹罕至的黄岩岛,便是其中之一。在“世界DX联络期望值排名”中,黄岩岛始终高居前三名。

经过我国有关部门批准,1994年,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组建了“国际联合DX远征队”,陈方的哥哥陈平,时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,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队员,参与到了为黄岩岛争取“DXCC呼号”的第一次远征行动中。可是,由于当时为电台架设平台的四条腿没有支在干地上,而是插在离岛石一米远的海水中,不

代表中国电台,“S”代表南海诸岛,“7”代表其行政归属海南省在我国第7区,“H”代表黄岩岛。这一呼号的取得,意义重大——从此以后,只要“BS7H”呼号在空中出现,全世界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便能一眼看出,它来自黄岩岛,来自中国。

刚开始在岛礁上工作,头顶就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,陈方看见,两架飞机正向远处的74号船俯冲而去;

赵力平,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1944年经组织介绍,在贺龙的撮合下,三张铺板一拼,与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结婚。解放后,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,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,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,1988年离休。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,其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在1983年9月“严打”期间,以“流氓罪”被枪决了。

对于唏嘘往事,赵力平非常释然,“想得开很”。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1949年天津解放,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。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,我担任组织科科长。1957年,干部支援文教系统,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,一直做了17年。那时候组织上让你上哪,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,让你去你就去。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,也不敢要求调动。我想调也不敢说。我爱人在北京,我在天津,这么来回跑,很辛苦。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,休一天,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。

1950年,我怀孕了。孩子降生之际,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。于是,爹爹给孙子起名“援朝”。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。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,送到了北京。

一年后,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。此时,双方已开始在“三八”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,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,但和平前景可睹,因而爹爹为他取名“和平”。和平刚8个月,就被送进了中南海。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,我们的周末和假期,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。

朱琦在“文革”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。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,他们整不着爹爹,就拿朱琦撒气,批斗、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1972年,恢复工作后,由于劳累,也由于“文革”这几年的折磨,朱琦患了心脏病,在家休养。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,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,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,突然感到不舒服。等我赶回家,他已经走了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朱琦走时,只有50多岁。

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

1983年“严打”期间,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,国华就在里面。国华1957年出生,出事时才25岁。他不是什么什么天津银行的行长,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。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。

国华不爱说,不怎么出去,他喜欢画图,制作写字台、单人床,像个“小木匠”。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,地上有地毯,桌上有电视机,都没买。当时的形势是“严打快打”。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,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,肯定不会难为他,国华被推到最前面,结果其余人被放,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。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。有很多不实的传言,比如说:“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,做了他的思想工作。”“康克清很气愤,说‘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!’”“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,想给孙子减刑。”

其实,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,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。有人说,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:“你们出了问题,不是个人的事,是在折腾你爷爷!爷爷有话在先,你们如果不争气,做了违法的事,要我登报声明,与你们断绝关系!”这话我也没听过。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第15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)



陈方两度登上黄岩岛,一共在岛上作业13天。

算陆上操作,国际组织认为不能以此为证将黄岩岛列入“DXCC实体”。

陈平他们吸取教训,于1995年启动了第二次远征。这次远征结束后,陈平即刻赶往美国,在DX会议上首先强调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,然后就黄岩岛为什么应该被认定为“DXCC实体”进行了陈述,终于说服了在会的各国人士,承认了黄岩岛的“DXCC实体”。自此,黄岩岛终于拥有了一个被国际承认的无线呼号——“BS7H”,“B”

代表中国电台,“S”代表南海诸岛,“7”代表其行政归属海南省在我国第7区,“H”代表黄岩岛。这一呼号的取得,意义重大——从此以后,只要“BS7H”呼号在空中出现,全世界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便能一眼看出,它来自黄岩岛,来自中国。

陈方介绍,在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界,有一个大家认为最公正的“游戏”——“DXCC”。“DXCC”指的是“联络百个远距离电台俱乐部证书”,也就是说,如果能联络到100个“DXCC前缀表”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业余电台,便有可能获得该证书。该证书由美国无线电转播联盟颁发,在业余无线电界影响最大。如同集邮一般,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迫切地想来自“DXCC表”中的每一个地点进行无线电联络,或者亲自到那些人迹罕至的“DXCC实体”去操作业余电台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,没有进行过业余电台远征活动的岛屿已经所剩无几,地处偏远,人迹罕至的黄岩岛,便是其中之一。在“世界DX联络期望值排名”中,黄岩岛始终高居前三名。

经过我国有关部门批准,1994年,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组建了“国际联合DX远征队”,陈方的哥哥陈平,时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,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队员,参与到了为黄岩岛争取“DXCC呼号”的第一次远征行动中。可是,由于当时为电台架设平台的四条腿没有支在干地上,而是插在离岛石一米远的海水中,不

代表中国电台,“S”代表南海诸岛,“7”代表其行政归属海南省在我国第7区,“H”代表黄岩岛。这一呼号的取得,意义重大——从此以后,只要“BS7H”呼号在空中出现,全世界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便能一眼看出,它来自黄岩岛,来自中国。

刚开始在岛礁上工作,头顶就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,陈方看见,两架飞机正向远处的74号船俯冲而去;

赵力平,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1944年经组织介绍,在贺龙的撮合下,三张铺板一拼,与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结婚。解放后,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,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,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,1988年离休。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,其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在1983年9月“严打”期间,以“流氓罪”被枪决了。

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

1949年天津解放,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。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,我担任组织科科长。1957年,干部支援文教系统,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,一直做了17年。那时候组织上让你上哪,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,让你去你就去。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,也不敢要求调动。我想调也不敢说。我爱人在北京,我在天津,这么来回跑,很辛苦。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,休一天,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。

1950年,我怀孕了。孩子降生之际,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。于是,爹爹给孙子起名“援朝”。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。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,送到了北京。

一年后,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。此时,双方已开始在“三八”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,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,但和平前景可睹,因而爹爹为他取名“和平”。和平刚8个月,就被送进了中南海。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,我们的周末和假期,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。

朱琦在“文革”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。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,他们整不着爹爹,就拿朱琦撒气,批斗、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1972年,恢复工作后,由于劳累,也由于“文革”这几年的折磨,朱琦患了心脏病,在家休养。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,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,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,突然感到不舒服。等我赶回家,他已经走了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朱琦走时,只有50多岁。

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

1983年“严打”期间,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,国华就在里面。国华1957年出生,出事时才25岁。他不是什么什么天津银行的行长,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。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。

国华不爱说,不怎么出去,他喜欢画图,制作写字台、单人床,像个“小木匠”。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,地上有地毯,桌上有电视机,都没买。当时的形势是“严打快打”。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,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,肯定不会难为他,国华被推到最前面,结果其余人被放,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。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。有很多不实的传言,比如说:“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,做了他的思想工作。”“康克清很气愤,说‘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!’”“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,想给孙子减刑。”

其实,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,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。有人说,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:“你们出了问题,不是个人的事,是在折腾你爷爷!爷爷有话在先,你们如果不争气,做了违法的事,要我登报声明,与你们断绝关系!”这话我也没听过。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第15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)

然后掉头,又向72号船及正在搭建平台的3个岛礁做俯冲飞行。他们全然没有理会战斗机的一遍遍威慑,继续埋头工作。

5月1日凌晨,5艘灰色菲律宾护卫舰悄然出现在海面上,一些军人乘着橡皮艇,或干脆游到远征队员搭建的平台下方,一边查问队员们是不是军人,一边试图上岛,但遭到中国队员的严词拒绝。

临走时,陈方和其他队员分别来到3个比较大的岛礁上,举着国旗合影。其中只有一个念头:“愿祖国更强大,我们的每一寸领土都不容侵犯!”

那一刻 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

1997年的远征是极其成功的,在72小时的时间内,队员们共联络到6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0多个电台。队员们甚至不用自报呼号,他们频频改到哪里,哪里便热闹非凡,他们与每个电台的通话往往只有一两句,然后赶紧挂断,联络另一人,因为“世界在等着呢”,陈方此时回忆起来,还是一脸的自豪,“一时间,黄岩岛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,仿佛我们在‘领导’世界。”

但是,1997年以后,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,黄岩岛再也没有传出任何电波。直到2007年4月,包括江苏的陈方在内的16名中外业余无线电远征队员,乘坐江苏一艘不足百吨的香港渔船,顶着剧烈的晕船反应,行程七十多个小时,再次来到了黄岩岛。从4月29日晚至5月6日晨,“BS7H”与世界各国业余电台进行了45000多次联络,在国际业余无线电界引起了巨大反响,爱好者为再次听到来自黄岩岛的叫喊而激动万分。

“其实我们最初只是为了无线电爱好而去,”陈方说道,“但我们以行动,宣示了国家主权,这点,我至今还是引以为豪的。”

(摘自《现代快报》5.13 王颖菲/文)

在空中迎接中共中央副主席

1974年春,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同志在总参、北京军区首长陪同下,来承德地区视察,专机定在下午2时降落。当时我负责迎接首长的安全保卫和交通保障等工作。

在机场等候时,我手下的军官建议说,他们一直没坐过飞机,现在离首长到达还有1个小时,能不能现在上前站机在承德上空兜一下过把瘾。我们算了一下时间绰绰有余。于是,除留两名哨兵外,其余20多人都上了飞机。大家正高兴地在空中观赏承德的时候,机长突然接到电话,说首长的专机已经临空,将提前降落承德机场。我赶紧请机长降落。按规定,专机临空,其他飞机一律要回避。没办法,我们的飞机只好在空中绕着圈飞,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啊。

结果,首长们1时30分降落到机场上时,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事后,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党小组会,要我说明情况,深刻检讨,并准备接受处分。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么回事?有人告诉他详情后,李德生说:“战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嘛,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,就不一定要处理了,算了吧。”

我事后反思,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,不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,误读上意。这件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——创下在空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。(作者周玉书中将,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、武警部队司令员)

(摘自《新快报》周五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)

蒋介石并未毒死我父亲

著名作家白先勇,日前在纪念其父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的新书首发式上,就其父去世的种种传闻做了澄清。在他看来:蒋介石不可能派特务毒杀白崇禧,父亲的死因就是心脏病突发,他一向冠状动脉有点扩大,这是家族遗传,自己也有。

1996年白崇禧过世,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,传言他被毒死,面色发绿,床头有半瓶酒,床单有撕裂的痕迹,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箱中下毒,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,趁机谋杀。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:“我弟弟看到了遗体,很平静,完全没有这些迹象。他确实是喝药酒的,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里,就传出来说毒药一说。那个医生赖少魂,是很有名的‘国医’,人家大‘国医’还会这样下毒吗?”

在采访中,白先勇还谈到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,“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,一共四十年。的确,蒋很倚重他,尤其是在北伐、

抗战的时候,可是很重要的时候蒋又没听他的话,他们两个人有分、有合,有亲、有疏,非常复杂。蒋对于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赏识的,否则他不会在北伐时是蒋的副参谋长,抗战时是他的副参谋总长,国共内战时是国防部长,都是他的最高军事幕僚长。可是,自古以来双雄不能并立,我父亲的个性也是很强的人,而且他常常犯颜直谏,忠言逆耳,很多他讲的话蒋没有听。”

对于“蒋介石派人下毒杀害白崇禧”的说法,白先勇认为这纯属是谣言。他向记者说了三点理由,“第一,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叫谷正文,他自称是蒋介石安排的监控我父亲的小组成员,但事实上那个小组根本就设这个人,而且他也没机会见到蒋介石。第二,当时父亲在台湾时没有实权的,蒋没理由杀他。第三,我父亲是在美国受过勋章的,就国际影响而言,蒋也不会杀他。”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4.25 蔡发 陈权/文)

结果,首长们1时30分降落到机场上时,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事后,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党小组会,要我说明情况,深刻检讨,并准备接受处分。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么回事?有人告诉他详情后,李德生说:“战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嘛,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,就不一定要处理了,算了吧。”

我事后反思,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,不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,误读上意。这件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——创下在空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。(作者周玉书中将,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、武警部队司令员)

(摘自《新快报》周五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)

那个

那个

结果,首长们1时30分降落到机场上时,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事后,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党小组会,要我说明情况,深刻检讨,并准备接受处分。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么回事?有人告诉他详情后,李德生说:“战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嘛,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,就不一定要处理了,算了吧。”

我事后反思,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,不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,误读上意。这件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——创下在空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。(作者周玉书中将,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、武警部队司令员)

(摘自《新快报》周五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)

那个

那个

结果,首长们1时30分降落到机场上时,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事后,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党小组会,要我说明情况,深刻检讨,并准备接受处分。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么回事?有人告诉他详情后,李德生说:“战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嘛,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,就不一定要处理了,算了吧。”

我事后反思,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,不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,误读上意。这件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——创下在空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。(作者周玉书中将,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、武警部队司令员)

(摘自《新快报》周五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)

那个

那个